



【名家背影】

## 四月的怀念

□袁忠岳

四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季节，不仅因为它是春天，还由于它的萌动引发了人们的回忆，正如艾略特在《荒原》诗中写的：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孔孚是1925年4月1日出生的，于1997年4月27日离开了我们。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在4月，那是1981年，落款的日子是4月12日。算来我和他相识相知也有16年，他走了有20年，加起来已是36年了。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忠岳同志：听心焕谈到您，惜未得一见，为憾。您在《山东文学》上发的诗论的文章，我认为是有见地的，很喜欢读。又听心焕说，你对我的一些小诗感兴趣，打算收集起来看看，我想是遇到一位知音了。自然高兴不迭。”

那时我还在兖州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刚在《山东文学》发了两篇诗论《“似无理”和“似太俗”》和《懂不懂与美不美》，正像春雨催促下萌发的两根“迟钝的根芽”。前者借香菱学诗谈古诗的欣赏，后者说的是朦胧诗，都是强调诗的品位的。偶尔读到印在刊物上的孔孚诗时，如见芙蓉出水，一股清新简约和美之风扑面而来，同为突破风气之作，其与朦胧诗又很不一样。

孔孚诗明白如话、意蕴深含，寥寥数语胜却千言。如写《钟》，“沉默不知多少年了/看见它就难受/不知是否还活着/我轻轻拍它一声”；再如写《老柏》，“两千年风刀霜剑/不知几经雷电/它已经死了/但又伸出枝叶一片”。这是只有同样经历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才有的切身感受，故于我心有感焉，立刻引起我的共鸣。

那时并不知道诗人曾为大众日报副刊编辑，后被打入另册让去养猪。是到济南开会时与在山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书新和蒋心焕谈到孔孚的诗，他们告诉我孔孚就在他们山师，并说愿意把我介绍给他，于是才

有前面提到的孔孚给我的第一封信。此后不久，去济南时到过他家，见过面，吃过饭，谈过话，不过主要还是靠通信联系。直到1986年1月我调入山师，才不用这种书面方式了。在这差不多5年的时间里孔孚给我的信，粗略一数，竟然有65封之多。

这些信主要是谈诗，包括诗艺、诗论、诗观，乃至个别诗的改动等等。如第一封信后，立刻又收到他寄来的1980、1981这两年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他的诗的目录，用5页稿子誊写清楚，方便我去收集、阅读。

那时我已开始着手写孔孚诗的第一篇评论了，他知道后不断予以鼓励，说：“对于你这位知音，我致以衷心的感谢。讲‘发现’，你不是最早的，但无疑是最有分量的。”(1981.5.9)“诗之不足处，希不要留情。深盼能从你的文章中受到教益。”(1981.6.7)最让人感动的是我把写成的初稿寄给他后，他在6月12日马上回信，开头就是：“谢谢您啦！您是在给上一堂课呢！”接着他说他眼睛不好，收到稿子后就去找好友徐北文先生了。徐老正在吃饭，随吃随翻。孔孚在信中写：“我说不忙，想不到他竟是停不下来，迅速地翻下去，饭也忘了吃了。我知道，你把他抓住了。”徐老看了有什么意见呢？他也一字不落地转告了我，徐老说，“文章好。观点大多和我相同。层层剥笋，看得出，但层次似不够分明。还可考虑。如能点一下传统的继承(古典诗歌)、横的移植(外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有所创新，格会更高。”又说，“不过，这样就可以了。是一篇不多见的文章。”孔孚信中高兴地说：“能得北文这一评价，是难得的。从他口里，难得听到赞美之词。”孔孚尽管眼睛不好，也还是迫不及待地把我写的稿子分几次读完，并随

忘不掉的是孔孚的四月来信，是他来信中那炽热感人的文字和深情殷切的期盼。正是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研究孔孚和其他当代诗人的探索之路，孔孚山水诗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手作了批注，供我修改时参考，却又特地加上“不作数，你可以完全不理”。

之后还为我的稿子在哪儿发表操心。当时能发表诗歌评论的重镇也就是《诗刊》和《诗探索》。孔孚在6月19日的来信中说：“《诗刊》是懂诗的，也颇喜欢我的诗，但在编排上一直不能处理得使人满意，仍不过是盘凉拌菠菜而已。特别是在集中宣扬得奖作品之际，发出去真是不太容易。”又说：“《诗探索》有可能发。因为他们不那么老气。谢(冕)、杨(匡汉)、丁力轮流主持发稿，因观点不一致故也。但也难以把握。这种山水诗在有些人眼里，究竟能有多少分量，很难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孔孚的心态，对自己的诗能否被诗坛认可、予以关注，尚存疑虑，所以对我的文章不能发表也没有把握，但觉得似可借此试探诗坛以及社会对他的诗的重视度。所以他接着说：“如真的能发出去，那倒是很有趣的事。这要看《诗探索》编辑部诸公是否如我兄那样看待拙作了。”经过一番考虑，他认为“还是寄《诗探索》为宜”，并特地写下该刊当时的地址：北京日坛路6号，并叮嘱挂号，心细至此。最后我的这篇《孔孚山水诗的艺术特点和社会意义》万言长稿，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型评论刊物《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三期上。至于怎么发到这个刊物上去的，我忘了，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个刊物的存在。是否我把稿子寄给了《诗探索》编辑部，是他们把它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整个过程忘得无影无踪，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忘不掉的是孔孚的四月来信，是他来信中那炽热感人的文字和深情殷切的期盼。正是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研究孔孚和其他当代诗人的探索之路，孔孚山水诗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982年夏天，在烟台主持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聘请钱谷融先生讲课。课后他亲口对我说：“以后我不再写了。”

我不觉一惊，钱先生当时不过64岁，正当创作盛年，大家都盼望看到他的新作，怎么“不再写”了呢？

后来逐渐明白钱先生所说的“不再写”，其实是寻常人难以做到的。如钱先生自己所慨叹的：“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名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

虽然与钱先生接触不多，但因为他的“文学就是人学”的高论和“不再写”的“散淡”，使我对他深为敬重，所以盼望再次晤谈。

11年后的1993年10月，我在上海逗留，拜托陈子善先生牵线去看望钱先生。饭后两点半了，子善说钱先生午睡已过，可以去了。我才深怀仰慕之心前往拜见，走进楼道就有一种洁净的感觉。及至进了钱先生家门，走入他的书房兼客厅，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虽然书桌和书架上的书有些凌乱，但是从地板到桌案都十分清洁。钱先生刚睡过午觉，精神焕发，眉毛很长，有几根凸现出来，也洁净至极。

联想起徐梵澄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午睡后的情状：“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乾，惘然非人。’”从中我忽然悟出：钱先生的“不再写”是一种难得的超拔脱俗的“淡”，这种“淡”正来自于“清”。因为过的是清白干净的生活，所以对世间的种种诱惑处之淡然，因而也就“高”。合而为之，就升入“清高”之境。不然，以先生的威望与弟子的高品位，像一些稍有权势和影响的人那样，或者不断重复自我，制造垃圾；或者申请个什么社科项目，拿到多少万资金，找自己的门徒一人一本，凑出一套八卷十卷的大书，自己挂以主编大名，既凭空获得大把的钞票，又博得著作等身的热捧，岂不美哉！然而，钱先生没有这样做，连边都没沾过。他只是“有感而发”，“不弄虚作假，不哗众取宠”，宁可沉默，一字不写，也绝不为了某种利益而硬凑文章，更不在什么大书上挂名。这是何等难得的“清高”！

其实，推动学术前进的，乃是“文学就是人学”那样的奇绝独见，并不是文章的篇数和出书的部头和本数。钱先生所敬佩的那位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诗绝千古”；钱先生的“文学就是‘人’学”也可以说是“一论绝千古”。这一句话、一篇论文足以不朽！“非深于情，不能作此文！”有这位“情人”在，千百年足矣！何必再写？能够写出超越自我的作品，又有精力去写，固然是好事，但是既然无人包括自己都不可能超越了，还再写什么？何如以“不再写”的精神，坚决地守持真理，培养弟子，保持自身的清白与健康呢？那些制造垃圾、想方设法捞取名利、在种种大书上挂名而“著作等身”者，因为蝇营狗苟、四处钻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闹得心身交瘁、疲惫不堪，必定难得钱先生的清静与长寿！

钱先生的“不再写”，恰恰是一种人生与学术的“高境”。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化杂谈】

## 钱谷融先生的『不再写』

□张梦阳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